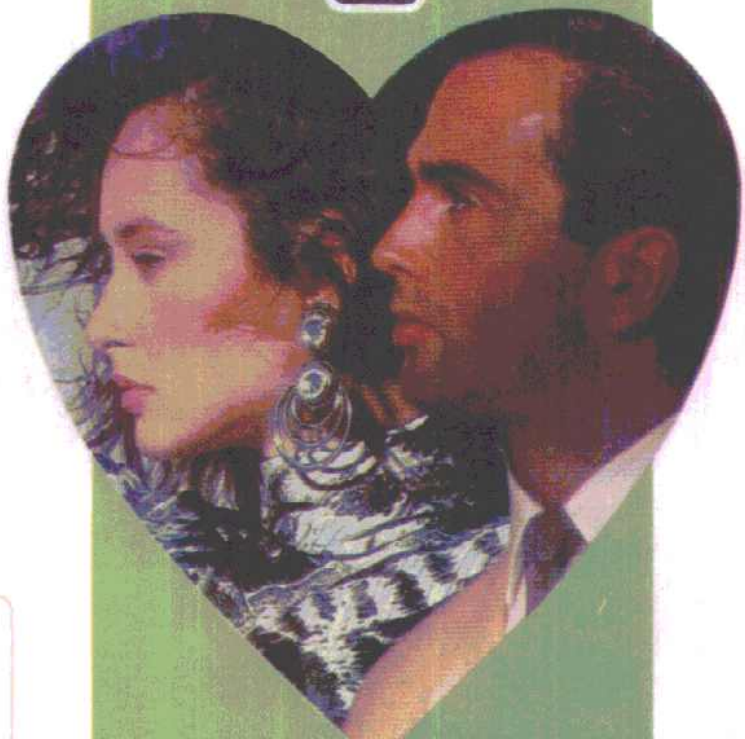


〔美〕埃利希·弗洛姆 著
都本伟 赵桂琴 译

人之心

——爱欲的破坏性倾向

辽宁大学出版社



428

人之心

爱欲的破坏性倾向

[美] 埃利希·弗洛姆 著
都本伟 赵桂琴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A0335642

责任编辑 王本浩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赵 伟

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
by

Erich Fromm

Happer & Row Publisher,
New York, U.S 1980

根据纽约哈珀和罗公司1980年版译出

人 之 心

——爱欲的破坏性倾向

[美]埃利希·弗洛姆 著

都本伟 赵桂琴 译

赵永波 校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20千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 5610 0374 9

1·97 定价: 1.70元

前 言

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我早期的一些著作的进一步展开和发展。在《逃避自由》中，我论述了自由以及虐待狂、受虐狂、破坏性等问题；同时，临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思索，引导我加深了对于自由以及各类攻击性和破坏性的理解。我已经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的攻击行为，这些攻击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在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现。如恋尸癖，这种破坏性的有害形式，就是与生之爱对立的对死的一种真正的爱。在《自为的人》中，我讨论了道德规范问题，这些道德规范完全是以人性为理论基础的，而不是以启示、人为的法律和协约为根据。在本书中，我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即恶的本性和善恶的选择问题。最后，本书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爱的艺术》的姊妹篇，主要的题目是讨论人们的爱的能力、破坏的能力、自恋以及乱伦的固恋问题，特别是对于非爱的讨论占了很大篇幅，而对于爱的问题，也从一个新的和更加广阔的领域加以探讨，即对生命的爱。我试图阐述生之爱、独立性、克服自恋形式的“生长综合症”（“Syndrome of growth”）以及与其相对的以死之爱、乱伦的共生现象和有害的自恋为形式的“堕落综合症”（“Syndrome of decay”）。

导致我对“堕落综合症”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不仅是基于临床经验，而且还基于过去几年来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更多的压力带来了这样的提问：为什么既然人们具备了善的意志和对于核战争后果的事实认识，但是避免战争的企图

与持续的核军备竞赛以及冷战的可能性的巨大危险相比较，是多么的软弱。对这样的问题的关注，引导我研究了在一个日益机器化的工业社会中对生活的漠视现象，在这个社会中，人变成了一种物，结果即使他不憎恨生活，也对生活充满了焦虑和冷漠。不仅如此，而且当今的暴力形式，无论在青少年犯罪中，还是在约翰·弗·肯尼迪总统的被刺中都表现的明显。这样就需要解释和了解走向变革的一个初步可能的步骤，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被引诱到了一个新的野蛮状态——即使没有核战争的发生——或者我们的人道主义传的复兴是否可能？

除了迄今为止所涉及的问题而外，本书的目的旨在澄清我的精神分析概念与弗洛伊德理论之间的关系。我历来不满意被归属于一个新的精神分析学派，不管这个学派是被称为“文化学派”还是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我认为，这些新学派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弗洛伊德理论中有价值的思想，但是也丧失了弗洛伊德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我肯定不是一个“正统的弗洛伊德派”。鉴于这一明显的事实，实际上，任何学说即使在六十年内没有变化，它也不再与这个学说的始创人原初的理论完全一致了；由于僵化的复制，这一理论实际上遭到了损害。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是在本世纪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中所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参考体系中构想出来的。我认为，弗洛伊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特殊的哲学参考体系，即辩证的人本主义。在本书中，我试图阐明，弗洛伊德的最大发现，象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自恋（Narcissism）、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等，由于他的哲学前提，而导致了损害。只有不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建立一种新的参考体系，弗洛伊德的发

现才能变得更加有效和富有意义。①我相信这个参考体系是人本主义的，它对于尖锐的批评，固执的实在论和理性信念等的奇妙综合也许会有效地发展弗洛伊德已打下基础的工作。这里，我想要再说明一点的是：虽然本书所阐明的思想是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全部临床工作的结果（而且在许多方面我正在研究社会过程），但是我省略了许多临床材料，这些材料，我计划用在一本论述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疗法的大部头著作中。

最后，我要感谢保罗·爱德华兹，他对于“自由，决定论，选择论”一章，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

埃利希·弗洛姆

注释：

- ① 我想要强调的是精神分析的概念并不是指以现在众所周知的“存在主义者的分析”来取代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们引用海德格尔或萨特（或胡塞尔）的话，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取代而没有把弗洛伊德与他在临床上各种相互联系的事实联系起来，是肤浅的。这也适用于一些“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和萨特的心理学思想的事实，尽管他们的理论不乏真知灼见，但仍然是肤浅的和缺乏可靠的临床基础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也象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一样并不是一个新开端，而是一个终结。他们的理论表达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的统治下的灾难之后西方人的绝望。但他们的理论不仅仅表达这种绝望，而是极端的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唯我主义的表现。如果我们涉及到同情纳粹的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在声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自称是未来哲学的萨特那里，这个问题又很容易误解。尽管如此，萨特还是批评利己和混乱的社会，并想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思想的代表者。许多体系已经包含了象上帝并没有给生活以意义和保证这样的观念，在宗教特别是在佛教中。不过，在存在主义看来，对于所有的人来，没有任何客观的确定的价值可供选择，在他们那里，自由的概念等于武断的自我，萨特和他的继承者丧失了有神论宗教和无神论宗教以及人本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章

人——是狼还是羊？

有些人认为人是羊；另有一些人认为人是狼。双方都搜集了充分的论据，以维护各自的观点。那些提出人是羊的人仅仅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人是很容易受他人的蛊惑所影响，即使这种蛊惑对他们来说是有害的；他们跟随其领导者投入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不能给他们带来丝毫利益，反而会导致他们的毁灭；人们容易相信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倘使有足够的力量和强权的支持，诸如来自于牧师和国王的严厉恐吓和说客的或隐或现的甜言蜜语。大多数人似乎是易受他人影响的，尚没有成熟意识的孩子们，在那些靠恐吓或蜜语支配他们的人面前，情愿放弃自己的意志。诚然，坚持己见是一反常规，这种一己之见通常在几个世纪以后，例外受到人们的赏识，而在它同时代却要被人们所嘲笑。

从人是羊的设想出发，宗教法庭和独裁者们建立了他们的制度。更有甚者，正是信奉人是羊，因此需要有领导者为他们做出裁决的信仰，导致了领导者们坚信：他们正在实施道德的责任——即使是悲剧的道德责任——如果他们能够提供人们需要的那些东西；如果他们是卸掉人们的责任负担和使他们自由的领导者。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是羊，那么为什么人的生活与羊的生活如此截然不同？人的历史是鲜血写成的历史，是连绵不绝的暴力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几乎永恒的暴力一直被用来屈服人的意志。塔拉亚特·伯萨独自就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吗？希特勒独自就杀害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吗？这些刽子手并不孤立，他们有成千上万为他们而屠杀、为他们而施虐的帮凶，这些帮凶在屠杀和施虐中不仅情愿，而且为此感到愉快。——在惨无人道的战争中，在屠杀和强奸中，在强者对弱者的掠夺中，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到处都有人对人的惨无人道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屠杀和苦难已经使人们充耳不闻、心如铁石吗？所有这些事实使一些思想家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得出了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象狼一样）；今天这些思想家已使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残忍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杀人者之所以约束自己的杀人娱乐，仅仅是由于对比他更凶狠的杀人者的畏惧。

然而，双方的争论使我们迷惑不解，确实我们自己了解了一些有威力或者闻名的杀手和一些象希特勒那样无情的杀人狂；但是这仅仅是一些例外而不是常规，让我们想象一下，难道你和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吗？一旦在我们摆脱了直到现在还阻碍着我们象野兽一样行动的禁忌之后，难道我们的“真正本性”会显而易见吗？这种设想是很难令人苟同的，而且并不完全可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很多可以从事残忍和虐待的行为而不担心报复的机会。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当他们碰到残忍和虐待时，他们产生了某种嫌恶感。

对于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令人费解的矛盾，难道有其它的或更好的解释吗？让我们设想一下，难道有少数的狼正在

与大多数的羊并肩地共同生活吗？狼打算去屠杀，而羊则想去追随。因此狼促使羊去屠杀、凶杀、扼杀，而羊则唯命是从，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羊喜欢这样做，而是由于羊想去追随狼；甚至杀手也不得不捏造了他们这样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抵抗对自由的威胁、为被屠杀的儿童和被强奸的妇女，以及违背礼仪而复仇，从而使大多数的羊象狼一样活动。这个答案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这难道不意味着人有两重性，就象刚才所谈到的那样，既有狼的一面，又有人的一面吗？此外如果人的本性与此相反，那么它怎么能够如此容易被说服象狼一样活动，甚至以提供暴力来作为他们神圣的责任为条件呢？我们对狼和羊的设想未必站得住脚，或许狼毕竟代表了人的本性，这一本性只是比大多数人的更为明显吗？或许羊和狼二者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的，也许人既是狼也是羊，或者人既不是狼也不是羊？

当有些国家企图使用最有破坏性的暴力去毁灭他们的敌人的时候，而且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他们自己在大屠杀中将要灭绝的可能性所阻挠时，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今天就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笃信人性是倾向于破坏性的，那么，人们使用武力和暴力的需要正根源于此，而且我们对日益增长的残忍行为的抵制就会变得愈来愈弱。当我们都已成为“狼”时，为什么还抵抗狼，尽管一些人比其他入更有狼性？

人是狼或者羊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的特殊形式，就这个问题的广泛性和最一般性来说，它是西方神学和哲学思想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人基本上是恶的和腐败的？还是善的和完美的？《旧约全书》并没有提出人基本上是腐败的观点。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不顺从（disobedience）并没有被称之为罪孽。

《旧约全书》也没有暗示这种不顺从腐蚀了人。与此相反，这

种对上帝不顺从的行为是人的自我意识和选择能力形成的前提，而且《旧约全书》在最后的分析中，认为这种行为是人迈向自由的第一步。还认为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不顺从是在上帝的预料之内；因为根据预言家的观点，人正是由于从伊甸乐园里被驱逐出来，他才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发展自己的力量，并且作为一个健全发达的个体而达到人与自然新的和协，从而取代了人尚不为个体，与自然先前的那种关系。预言家的救世理论肯定了人的本质基本上不是腐败的，而且认为没有上帝特殊的敕令，人也能够得到拯救，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趋于善良的潜能会自然占上风。如果人做恶，那么他就会变得愈加邪恶。因为他不停地做恶，所以暴君的心就愈加冷酷；他的冷酷达到了极点，任何变化和悔悟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旧约全书》向人们至少提供了许多行善和作恶的例证，但是并没有从作恶人名单上抹掉象大卫王这样被吹捧的形象。《旧约全书》的观点是，人有两种能力，即行善和作恶的能力，而且人注定要在善与恶、祝福与诅咒、生命与死亡之间作出抉择；即使是上帝也不能干涉他们的选择，上帝只能通过传递他的指令和预言等来帮助人们，并且教导人们达到实现善的标准，鉴别罪恶，提出警告和抗议。但是上帝做完这件事后，并不妨碍人的行善和作恶的“两种追求”，决定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基督教的发展与《旧约全书》的观点是不同的。在基督教会的发展过程中，亚当对上帝的不顺从被认为是原罪。事实上，这种罪孽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腐蚀了人的本性，并且遗传给了他的子孙后代，而且人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不能摆脱这种腐败。只有上帝的敕令，为人而死的耶稣基督的出现，才能泯灭人的腐败，并且为那些接受救世主的人提供帮

助。

但是，原罪的教条在教会里并不是没有遭到非议。派拉吉斯攻击它，然而失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教会内部试图削弱它，尽管他们不能直接地攻击或者抵毁它，然而很多异教徒却这样做了。如果说曾经有过人与生俱来就是邪恶和腐败的观点，那么路德就是这种观点的信奉者。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来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与此相反的方向上迈出的步子更激进。他们声称人的所有罪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环境的产物，因此人并不能真正地选择善与恶。如果改变产生罪恶的环境，那么人性善的方面才会自动表现。这种观点也涂上了马克思和他的继承者的思想色彩。信奉人性善是人新的自信的产物，也是自文艺复兴开始以来社会经济和政治巨大进步的结果。与此相反，西方的道德沦丧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超过了希特勒和斯大林所造成的后果。考文垂和广岛为全球的毁灭准备了条件，并且导致了传统强调人性恶的观点死灰复燃。当然这种人性恶观点的重新强调对那些轻视潜在人性恶的人是一付良好的解毒剂，但是，这种观点用来讥笑那些对人以诚相待的人们太频繁了，有时误解甚至歪曲他们的观点，却左右不了他们的立场。

当某人的观点经常被人们误解为是低估了人的潜在的人性恶的时候，我想强调这种情感上的乐观主义并不是我思想的基调。对于一个有着长期临床经验的精神分学者来说，轻视人的破坏性力量是相当困难的。他在工作 and 经验中看到了在患重病的人身上，不管是阻止这些力量，还是引导他们向健康的方向发展都是十分艰难的。同样，对于任何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罪恶和毁灭性破坏的人来说，无视于这种破坏性的力量和强度都是不可能的。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势力，一

种危险即无力感的出现支配着今天的人们——知识分子以及平民百姓，这导致他们接受新的原罪和腐败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成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主义者的合乎情理的借口，这是因为战争的结果是人性的破坏。这种观点有时自诩为敏锐的现实主义，但是有两点理由使这种观点不能成立。第一，破坏性倾向的强度一点也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占主导的。第二，这种观点的谬误是假定战争最初是由心理力量造成的。完全陷入了在理解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心理学”谬误上。战争是政治的、军事的和商业寡头为扩充领土、自然资源和贸易优势而战的结果；同时也是对那些真正的或是伪造的侵害他们自己祖国安全的外部势力、威胁的抵抗；或者是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个人威信和荣誉的缘故而战。这些人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他们是自私的，他们没有为了其他人而放弃个人私利的动机；但是他们既不是狠毒的，也不是残忍的。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其说构成了祸害，不如说能够做出许多好事，但是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指挥成千上万的人，并控制了最有毁灭性武器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导致巨大的灾难。在文明的生活中，他们也许能够战胜竞争者；在我们这个强大的和主权国的世界里（主权意味着并不屈服于限制主权国的行动的任何道德规律），他们也可能毁灭人类。平凡的人占有了非凡的权力也能对人类——而不是对魔鬼或者虐待狂——构成主要的威胁。但是正如人需要武器以便参加战争一样，人也需要仇恨、愤慨、破坏和恐怖的激情，以便促使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争，并且变成战争的帮凶。这些激情是进行战争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并不是战争的起因，枪炮和炸弹本身才是战争的缘由。许多观察者已经注意到在这方面核战争是不同于传统战争的。当

按动电钮的人发射充满了携带许多核弹头的导弹的时刻，这些导弹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杀死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个按动电钮的人几乎体验不到士兵端着刺刀或者机关枪刺杀别人的感情。然而，即使发射核武器的行为仅仅是对命令的忠实执行，那么也有一个是否存在着人格的较深层次问题，如果这个人没有破坏性的冲动，那么就不存在着对生命的深深的冷漠无情，以至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

在我们的观察中，我选出三种现象，它们形成了人的倾向中最残忍和最危险形式的基础：死之爱(love of death)、有害的自恋之爱 (narcissism)、和共生的乱伦固恋 (symbiotic—incestuous fixation)。当这三种倾向结合为一体时，就形成了“堕落综合症” (syndrome of decay)，它激起人们为破坏而破坏，为仇恨而仇恨。与“堕落综合症”对立的，我称之为“生长综合症” (syndrome of growth)；它包括生之爱（与死之爱相对），人之爱（与自恋相对）和独立性（与共生的——乱伦固恋相对）。只有少数人是这两种完全发达的综合症之一，但是这并不否认每个人都向着他所选择的方向前进：生之爱或者死之爱，善之爱或者恶之爱。

第二章

暴力的不同形式

本书的主要部分论述的是破坏性的恶性形式，但是我想要首先探讨的是暴力的其它一些形式。我并不打算详尽无遗地阐述这些问题，而是确信与暴力关系不大的病理学现象，却有助于理解破坏性的严重病理学形式及其它的有害形式。形形色色的暴力的不同，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无意识动力的区别；因为只有理解了行为的无意识动力之后，才能理解行为本身、行为的根源、行为的进程以及行为背后的动机。①

最正常的和非病理学的暴力形式是游戏暴力（playful violence）。我们能够在发挥技能的暴力消遣中找到它，而不是在破坏性的事物里以及在仇恨和破坏性的动机驱使下的行为中发现。人们可以在许多情况下，找到游戏暴力的例子：从原始部落的战争游戏到佛教禅宗的舞剑对打艺术。在所有这样的战斗游戏中，杀人并不是目的；即使结局是竞争对手的死亡，但是象以往一样，竞争者的过失是由于他“站在错误的地点上”。当然，当我们谈到不愿在游戏暴力中毁灭时，这仅仅是涉及到了这种游戏暴力的理想类型。在现实中，人们通常会发现在游戏的精密逻辑背后，隐藏着无

意识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尽管如此，这类暴力的主要动机是技能的显示，而不是破坏。

比“游戏暴力”更有实际意义的是“反应暴力”(reactive violence)，我所理解的反应暴力是指保卫自己或其他人的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时使用的暴力，这种暴力形式的根源是恐惧，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它大概是最普遍的暴力形式；这种恐惧可能是现实的或者是想象的，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这类暴力维护着生命，而不是维护死亡；它的目的是生存，而不是破坏。它并不完全是非理性激情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理性的计算；因此它也意味着一定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均衡。人们争论道，从较高的精神层次来看，杀戮——即使是为了防卫，也从来是不道德的，但是那些坚信这种观点的大多数人承认，自卫的暴力在性质上是不同于为他自己的缘故而旨在破坏的暴力。

通常，这种被恐吓的感觉，并且导致反应暴力的产生并不取决于现实，而是取决于人的大脑思维；政治和宗教的领导者竭力说服受到敌人威胁的拥护者，以激起拥护者敌视的主观反应。因此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尤其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政府以及罗马天主教所确认的战争性质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通常双方都成功地散布了保卫自己反对进攻的舆论。^②几乎没有一场侵略战争不自称是自卫战争的。要求正当自卫的问题经常是由胜利者所断定的，有时则由以后比较客观的历史学家来裁决，人们借口任何战争都是防卫战争而发动战争是大势所趋，它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大多数人，至少是最文明国家的大多数人是不能被逼迫去屠杀甚至冒生命危险，除非他们首先认识到参加战争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第二，这种趋势表明，说服

成千上万的人们。说人们正面临被进攻的危险，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于是就有人呼吁人们保卫自己，这种主张的实现取决于大多数人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情感，也取决于大多数人在情感上依赖于他们的政治领导者。假如确实存在着这种依赖性，那么由权力和劝说提出的任何事情几乎都能被人们当作真实的加以接受，而且接受虚假恐吓的心理结果同接受真实恐吓的心理结果是一致的。人们感到受到了威胁，因此为了保卫他们自己，他们愿意屠杀和破坏。在具有迫害狂想的病例里，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仅存在于群体，而且也存在于个体之中。在这两种例子里，主观上，人们感到面临着危险，于是产生了攻击性的暴力反应。

另一方面，反应暴力是由于受挫而导致的一种暴力。当一个愿望或者一种需要不能实现时，我们在动物、儿童和成年人身上发现了攻击性行为。^③这种攻击性行为通过暴力的使用构成了一种实现受挫目的的企图，尽管这种企图通常是无法实现的，但是非常清楚，它是一种维护生命的侵略，而不是为了破坏的侵略。从古至今，在大多数的社会中，需要和愿望的受挫几乎是普遍的事情，因此毫无理由对于连绵不断的暴力和侵略的产生和出现感到惊奇不已。

与受挫而导致的侵略相联系的是由羡慕和妒忌所造成的敌视。羡慕和妒忌二者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挫败。它们是由这样的事实所引起的：B有一个A想要的东西，或者B被一个也正是A渴望得到的人所爱。B反对A得到的，也正是自己渴望的，然而却不能占有的对象，于是仇恨和敌视由此而生。羡慕和妒忌既是由受挫而产生的；又是由这样的事实所揭示的，即A不仅仅得不到他渴求的对象，而且被另一个更比他的人取而代之了。该隐(基督教《圣经》中亚当的长子——译者注)尽管自

身没有过错没有爱，却杀害了受到父母偏爱的弟弟的故事，以及约瑟（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译者注）与他弟弟的故事都是妒忌和羡慕的典型形式。精神分析的文献也提供了有关同样现象的大量临床资料。

同反应暴力有关的另一种类型的暴力，并且沿着病理学方向深入一步探讨的暴力是报复暴力。（revengeful violence）在反应暴力中，它的目的是防御受到恐怖的伤害，而且正是由于此，这种暴力只起到生存的生物学功能。在报复暴力中，一方面伤害已经形成既成事实，因此暴力并不具备保卫的作用，它只起着不可思议地毁坏已经形成定局的非理性功能的作用。我们发现报复暴力既存在于个体之中，也存在于原始以及文明群体之中。在分析这种类型的暴力非理性性质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入一步。报复的动机与个体或者群体的实力和生产成反比。软弱无力和残缺不全只有诉诸于恢复自我尊重，如果由于受到伤害使这种自尊感丧失了：根据以眼还眼的惩罚法，人们就必须采取报复手段。但一个正在从事于生产的人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报复需要。即使他已经受到了危害、侮辱和伤害，但是正在进行着的生产过程使他忘记了受到的伤害。因为生产的能力比复仇的愿望更加强烈。根据个体和社会范围内的经验资料，上述分析的真理易于成立，心理学的分析材料也证明了一个成熟的、多产的人比一个难于独立和完美地生活的精神病人更缺乏报复行动，而后者经常把自己的全部生存系于复仇的愿望上。在严重的精神病理学中，复仇变成了他生命的最高目的，因为不复仇，不仅仅自尊感崩溃了，而且威胁到自我感和个性感的存在。与此相似，我们发现在最落后的群体里（经济或者文化与情感方面），复仇情感似乎最强烈（例如为了过去国家的